

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 一种包容与多元的理论

同子怡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以包容与多元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问题,将殖民历史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背景,破除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偏见。后殖民理论经历萌芽、形成和深化三个发展阶段。在本体论方面,后殖民理论主张主体间的、互构的立场;在认识论方面,后殖民理论注重对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考察,突出“叙事”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在方法论方面,后殖民理论采取深入历史的、反思性的研究方法。后殖民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构,重点表现在“民族国家”“不平等”等核心概念、“安全研究”“全球化理论”等研究议题方面。作为具有反思力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后殖民理论将构建更包容与多元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后殖民理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 历史叙事

* 同子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笔者衷心感谢张清敏教授和于铁军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指导。本文是在提交给“第十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的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各位评议人的点评,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国际关系研究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始之时,研究的重点就集中在殖民问题与种族关系之上,然而,随着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对殖民的研究反而被逐渐边缘化,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① 为了改善既有研究中的知识霸权,拓展理解国际行为的视角,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具有反思性的理论。作为一种包容与多元的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融合在此意义上凸显出其使命和价值。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过西方殖民统治的侵略,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至今仍影响着国际话语权,“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的共同愿望为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思想基础,^②因此,后殖民理论形成后被国内多个学科领域译介与探讨。^③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尚不充分,系统性梳理后殖民理论特色与贡献有待加强,而将后殖民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也需进一步推进。^④

为此,本文将运用比较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后殖民理论的代表性文献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文献,综合最新阶段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对后殖民理论的学术脉络、哲学基础和核心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期说明国际关系研究中后殖民理论的内涵、智识贡献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后殖民理论发展脉络与基本内涵

殖民主义一般指宗主国通过强制手段对殖民地实行政治、经济与社会控制的行为,^⑤后殖民理论由“后殖民”(post-colonial)这个概念发展而来,字面意

① Tarak Barkawi, “Empire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ies,” in Robert Denemark, 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Vol. III,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0, pp. 1366-136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③ 最早系统性地介绍该理论的是《读书》杂志。1993年第9期《读书》发表了三篇评述萨义德作品的文章,参见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263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逐渐注意到后殖民理论的价值,有关中国学者在融合后殖民理论与国际关系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周桂银、包广将编:《国际关系理论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60—484页;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7页。

④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数据库使用学科分类检索,后殖民理论在这一学科分类的文章仅有83篇,且相关度不高,查询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

⑤ Jan Wilkens, “Postcolon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née Marlin-Bennett,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2.

指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又延伸为殖民统治的形式虽然结束,殖民主义却给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后殖民理论的产生正是对殖民主义及其余波的反应,^①后殖民理论将“后殖民”作为核心分析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其学理意义日趋完善,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理论内涵。

(一) 后殖民理论的发展脉络

1. 后殖民理论的萌芽期(20世纪中叶)。后殖民理论萌芽于殖民体系崩溃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殖民地国家掀起了广泛的民族独立运动,1975年,最后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从非洲撤出直接的殖民统治,被压迫民族终于获得形式上的民族独立。但是,新生国家虽然获得政治独立,却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多方面不能享有事实上的平等资格。^②从根源上看,后殖民理论萌芽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前殖民地国家追求民族独立思想在独立后的特殊国际环境下的延续。心理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革命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等人基于个人成长经历,在思想解放与政治独立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殖民书写,反对各种类型的殖民主义。这些个性化的作品虽然学理性尚有欠缺,但却成为后殖民理论的先声,为后殖民理论的体系化发展提供了现实养料,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思想基础。^③

这一时期,正逢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学科大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支持使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和支持使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④国际关系学科的西方色彩极为浓厚,第二次大辩论的结果几乎表现为美国推崇的行为主义方法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压倒性胜利,而其背后的哲学基底是根植于美

① 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2; [加]戴安娜·布莱顿、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尾声:反思自主性、世界主义和流散》,《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第181—185页。

② Bill Ashcroft,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71.

③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by Charles Markman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Ami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of Amilcar Cabr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④ 国际关系学科第二次大辩论一般指20世纪50—60年代有关方法论的辩论,参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249页。

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性的、寻求普适规律的研究路径。^① 这种研究范式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占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

后殖民理论在此阶段以一种理论体系的身份出现在学术领域,可以被视为对社会科学整体的学科潮流的一股“逆流之势”,它反对的是将学术的严谨性等同于运用实证性的、复杂的甚至是高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提倡的是反思看似客观的研究范式下的种种假定暗含的偏见。虽然这一时期后殖民理论并未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崭露头角,但是,它的整体思路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确定了基调。

2. 后殖民理论的形成期(20世纪70—80年代至20世纪末)。一般研究认为,后殖民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真正意义上将自身确立为了一种明确的理论路径,其形成标志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② 萨义德借鉴法兰西学院教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框架,考察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中暗含的全球非平等关系,揭示出近现代西方学术的知识—权力问题。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详尽剖析了“东方学”这一概念,将“东方学”界定为西方人构建的关于东方知识的学术传统,引申为西方人运用认知、形塑乃至支配东方世界的知识体系。^③ 在东方学的话语影响下,西方人将“东方”想象为一种从属于西方的劣势文明,被长久地遗留在“历史的等候室”(the waiting-room of history)中。^④ 后殖民理论受到《东方学》的深刻影响,确定了自身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核心关注点和研究路径,即通过话语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打破学术的知识偏见,提供另一种看待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叙事。自此,后殖民理论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的理论流派。

① Michael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4-26.

②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xxvi; Ania Loomba,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46-47.

③ 在《东方学》中,“东方”指的是中东一带,并未扩展到世界上更多的欠发达地区,后来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者借鉴萨义德的理论框架,将“东方”的含义不断扩大,指代所有非西方国家与地区。

④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 pp. 1-8;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广义的后殖民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繁盛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激进文化氛围等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学术思潮的碰撞、大众文化的高涨、政治实践的配合均成为这一时期后殖民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力。在此阶段的政治实践中,平权运动方兴未艾,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又一次被推到时代的幕前。^① 欧美国家的内部矛盾愈加凸显,一时间在精神领域形成了一股批判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思潮,后殖民理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佳亚特里·斯比瓦克(Gayatri Spivak)和哈佛大学人文学教授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的学理性,因而,他们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② 在那个批判性思潮异常活跃的年代,对后殖民理论的关注与应用不再局限于文艺领域。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阈中也开始出现后殖民理论的身影,它聚焦于研究具体的殖民进程和不平等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突出国际互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③ 不过,后殖民理论进入国际关系学科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在这一时期一些具有反思力的学者将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此重新审视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的演变。^④ 但是,在此阶段还不能真正称后殖民理论自觉地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补充。

在南方与北方、西方与非西方的理论对话中,社会科学整体显示出了充足的对话意愿与活力,广义的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等视角成为批判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的主力军。不过,国际关系理论在这场反思性的对话中并未扮演突出的角色,事实上,这一阶段反而是理性主义如日中天之际,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国际关系研究,

① Hans Bertens,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93.

② 参见 Robert J.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63; 斯比瓦克和巴巴的代表作可参见 Gayatri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3; Homi K.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③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4-115.

④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他直言无需将过多关注放在西方大国之外的地方。^① 在此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格外凸显^②,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上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更表现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科学”的名义对所有不符合实证主义建立因果机制和假设检验的理论进行攻击,导致国际关系学科几乎成为“美国的社会科学”。^③

美利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曾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知识具有一种“规训作用”(disciplining function)。^④ 国际关系研究被西方学术路径所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从“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的知识生产结构中脱身,其著述往往散见于批判某个主流理论的文章中,并未受到主流国际关系界的严肃对待与回应。^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在占据绝对的知识生产权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表明国际关系研究势必需要反思的声音,由此进一步激发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状况为 20 世纪末以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3. 后殖民理论的深化发展期(20 世纪末以来)。20 世纪末以来,后殖民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在此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对前两个阶段中出现的复杂多义的后殖民理论与概念进行整合,涌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 96;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 16.

② Karen Smith and Arlene Tickner,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in Arlene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7-8.

③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106, No.3, 1977, pp. 41-60;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in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5-6; Thomas Biersteker, "The Parochialism of Hegemony: Challenges for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rlene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08-327.

④ Patrick Jackso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9.

⑤ Arlene Tickner, "Seeing IR Differently: Notes from the Third World," *Millennium*, Vol.32, No.2, pp. 295-324;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张发林:《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 年第 4 期,第 25—34 页。

现出一大批概述与总结后殖民理论的学术研究成果。^①同时,随着理论系统化程度的提高,后殖民理论在此阶段亦开始进行反思。比如,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从历史角度批评《东方学》,反对将东方学片面理解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强制控制手段。^②发展至此,后殖民理论拥有了更强的自我革新力量,展现出扬弃中的理论活力。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后殖民理论正式地进入国际关系学科,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积极且充分地运用后殖民理论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将“后殖民”的角度作为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行为的重要棱镜。后殖民理论明确了其介入国际关系学科对话时所使用的规整的、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殖民权力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并分析了国际关系与后殖民理论相结合的应用场景,展示出运用后殖民视角研究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的操作化方法。^③

后殖民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内的蓬勃生发与整体上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态势不可分割。主流理论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等议题上的脆弱解释力令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拥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国际关系学科自身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一次经历了学科大辩论,此次论战双方是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这场大辩论一度掀起了国际关系的“本体论革命”,非西方国际关系以后实证主义的视角动摇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本支点的假定,很大程度地创新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式。^④这一时期的后殖民理论越来越将自己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组成部分,有机地对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传统,承接批判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具有批判性思想的理论,从“中心—边缘”的框架出发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国际关系相关研究,展示看待世界政治的不

① 代表作包括 Peter Childs and R. J. Patrick Williams,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Verso Books, 1997。

② John M. MacKenzie,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5.

③ 融合后殖民理论与国际关系的代表作包括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eds., *Power, Post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Karen Smith and Arlene Tickner,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pp. 4-8.

同方式。^① 多样的反思性理论从不同视角促使国际关系理论在一次次论辩中走向成熟,因而,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无法再忽视非西方的声音,国际关系学科走向了“第三次奠基”。^②

可以看出,最新一个阶段的后殖民理论在哲学思路、核心假定与研究议题上均与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交融共通。^③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指与“北方”(North)相对的中低收入国家,它的概念在国际政治中是较为综合性的,也用来指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方面处在边缘的国家。在广义上,受到殖民主义残留影响和大量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国家被统称为“全球南方”,“全球南方”甚至成为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想象”。^④ 后殖民理论发展的最新阶段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走向幕前的重要机遇时期,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驳斥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理解世界和构建知识的方式,希望通过将“非中心”区域的学术研究纳入合法的知识范围来打破国际关系领域的“认知暴力”。^⑤

自2004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会议首次将“地缘文化认识论与国际关系的关系”作为重要议题以来,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注就持续高涨,其中,集大成之作是美国罗萨里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艾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及其合作团队编著的“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三部曲”^⑥,这一系列丛书为促进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多元化构筑了坚实的理

① “全球国际关系学”一般指从非西方视角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而不是让非西方地区只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原料与检验场所,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27—45页;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41—147页。

② 刘德斌:《开启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奠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4日;〔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

③ 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封闭化思路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侧重略有区别,有时也作为替代性表达出现在研究中,与之类似的还有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不过,后殖民理论在很大意义上融入了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的建设队伍中。

④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2、88页;Karen Smith and Arlene Tickner,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p. 6.

⑤ Karen Smith and Arlene Tickner,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pp. 2-4.

⑥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三部曲”分别是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L.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Arlene B. Tickner and David L. Blaney, eds., *Claiming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论框架,拓展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边界。中国学者在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中亦有突出贡献,代表性学者如秦亚青、任晓、刘德斌、阎学通和唐世平等,这些学者提出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等包含中国色彩的理论视角均为国际关系理解复杂世界、打破知识霸权提供了新思路。^①

发展至今,后殖民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汇入了全球国际关系学建立的潮流中,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支充满生命力和创新性的力量。^② 后殖民理论不将非西方的经验视作个例,而是以“本土与全球”(local and global)的对话为切入点构建更加包容与多元的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一道改善国际关系中的知识生产不平衡问题。^③ 虽然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处在国际关系界的边缘位置,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其自觉程度和体系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从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视角出发,逐步朝着更深入的议题发展,越来越展示出学科交融互鉴的特质。^④

(二) 后殖民理论的基本内涵

后殖民理论在自身发展及与不同学科的对话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基本内涵,成为一支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理论。从后殖民理论的学术脉络中可以看出,“后殖民”概念萌芽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践,后殖民理论的“后”不单指在时间上晚于殖民主义,更表明尽管殖民主义在形式上退场,但世界范围内依旧存在着由殖民主义造成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并在很大程

①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27—45页;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第141—147页;任晓:《从世界政府到“共生和平”》,《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36—50页;Tang Shiping, “Practical Concerns and Power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162-163; 刘德斌、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7—161页;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程多闻:《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国际观察》2021年第2期,第1—30页。

②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p. 1-2; Tarak Barkawi and Mark Laffey, “The Postcolonial Moment i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2, No.2, 2006, pp. 329-352.

③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p. 10-11.

④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Introduction: Power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Race, Gender, and Cla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eds., *Power, Post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2;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张发林:《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第25—34页。

度上形塑了现有的国际秩序。^① 后殖民理论从各个角度批判现存国际秩序中严重的不平等倾向,要求改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因此,后殖民理论不是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一系列将“后殖民主义”概念嵌入理论核心分析框架的思想类型。^②

后殖民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殖民主义在历史与当下都有普遍性,从殖民主义及其余波的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其研究重点在于反映当今世界存在的种族不平等与压迫问题,理论根基立足于批判西方主流话语和叙事方式,揭示西方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知识—权力问题。诚然,剖析历史叙事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历史记述均是不真实的,而是指出强势的历史叙事对其他切面的忽略。西方主流理论抹去前殖民地国家自身的发展演进方式,并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取而代之,这种历史叙事将西方宗主国视为传播文明的使者,将落后国家的困窘归咎为自身的愚昧和懒惰。^③ 对此,后殖民理论批判性地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先进”与“发达”是建立在盘剥“落后”与“不发达”的前殖民地国家之上的,因此,不考虑殖民的历史过程势必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理解西方的近代化过程。

广义的后殖民理论希望通过揭露和解构殖民主义的影响,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霸权,以此超越把近现代历史看作欧美文明向世界范围扩展进而带动全球近代化的主流叙事。^④ 为了复现多元的历史进程,后殖民理论以众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群体与个体经验为分析对象,从“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互动式角度思考世界历史。后殖民理论在大量的原始资料中构筑“情境化”的

① John Baylis, et al.,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65-190;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Introduction: Power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Race, Gender, and Cla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12.

② Siba N. Grovogui, "Postcolonialism," in Tim Dunne,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29-246.

③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p. 46-69; J. K. Gani, "The Erasure of Rac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llusion of Kantian Hospitality," *Millennium*, Vol.45, No.3, 2017, pp. 425-446.

④ Dipesh Chakrabarty,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 Marshall Beier, "Beyond Hegemonic State(ments) of Natur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Non-state Possi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eds., *Power, Post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2-114.

阐释框架,试图还原在主流话语中未被关注的多重情境。^①这意味着后殖民理论不仅关注群体层面上前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化实践和反压迫的政治斗争,还关注个体层面上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被塑造的、道路选择是如何被限制的等。^②

广义的后殖民理论是一系列柔性的、以殖民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影响为对象的研究视角和框架,因此,可以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学科相结合,成为相应的理论分析工具。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在文学领域的应用集中在对前殖民地国家个体经验的强调,尤其关注殖民主义对当地人民造成的文化割裂以及个体归属感的缺失;^③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集中在对种族主义心理与情绪的探究,以及对不同社会中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的发掘;^④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集中在反对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单一历史叙述模式等。^⑤

本文侧重于探讨和分析后殖民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内涵、应用与意义。对国际关系而言,后殖民理论意味着识别出这一学科领域对殖民历史、帝国主义的忽视,主动将殖民历史纳入国际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分析殖民主义时期的权力关系及其余波对各国行为及世界秩序的影响。^⑥同时,后殖民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意味着与其他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一起,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生产垄断权,提出具备自身特色的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引导国际关系成为一门更具包容性和反思性的学科。^⑦

① Mustapha Kamal Pasha, "The 'Bandung Impul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48-150.

②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 39-75.

③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pp. 1-23.

④ Derek Hook, *A Critical Psychology of the Postcolonial: The Mind of Apartheid*,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⑤ 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107—116页。

⑥ David Long and Brian Schmidt, "Introduction," in David Long and Brian Schmidt, eds.,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1-23.

⑦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p. 4-6;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张发林:《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第25—34页。

二、后殖民理论的哲学基础

从研究的哲学基础看,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逐渐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在20世纪末的学科大辩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上走向合流,甚至连一度带有革新性的建构主义理论也越来越融入“新一新合题”(neo-neo synthesis)之中。^①而后殖民理论属于反思主义理论或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诸多不同,在哲学层面提出不同的思路与贡献。

(一) 后殖民理论的本体论

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假定存在一个“外在的”(out there)国际关系世界,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可认知的。在此假定下,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清晰地区分,通过观察、建立模型、检验与评估得出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因果链条。^②主流理论通过观测可被认知的客观事物理性化地认知世界,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的框架。但是,这种主流的研究模式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可变的、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因而在解释新的国际问题时越来越力不从心。各种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应运而生,后殖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③

在本体论层面,后殖民理论挑战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层面对世界是客观的、物质的假定,而主张世界是互构的、主体间的。后殖民理论认为,不同于自然科学,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等看似对立的概念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无法分割开来。^④历史上的殖民过程已经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当代世界的面貌,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反映

① 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147—148页;Arlene Ticker and David Blaney, *Claiming the International*, p. 11.

②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宋德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307页。

③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240—251页。

④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316—320页;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pp. 3-4.

的是西方现代化以来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思想倾向。国际关系的知识是一种主体间的知识,研究者无法将自身从社会中剥离,因而必然会在开展学术研究时天然地持有某种由互动而建构出来的个人价值与立场。如此一来,任何一种理论知识都与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如果对主流研究的立场缺乏反思意识,就无法呈现出国际社会的不同声音和多重历史。^①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的本体论假定是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的、原子式的国家单位作为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后殖民理论指出,原子式的本体假定否认了国际行为互动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国家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强行将国际关系与有关人类社会性质的理论分割开来”。^② 后殖民理论指出人类社会是高度复杂的和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由人构成的国家势必也是动态的和多样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个体主义假定忽视了国际关系实践的许多个性化切面,缺乏对丰富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考察。^③

因此,后殖民理论提倡的是一种主体间的、互构的本体论立场,在此层面上,后殖民理论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独特思路。有学者曾言,“国际关系研究是现代性的‘孝子’,而后殖民理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反叛”。^④ 现代性思维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普遍存在,是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的主流思维方式,它以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主要特色,坚信理性与进步的意义,并认为这种思路可以把对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理解整合进一个同一性的框架中。^⑤ 反思主义理论则对现代性中的人类进步及客观理性假定提出质疑,作为反思主义理论中的一员,后殖民理论致力于挑战现代性的本体论基础,它指出主流理性主义理论没有意识到西方界定的发展与进步是在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暴力

① Sharan B. Merriam,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hn Wiley & Sons, 2002, pp. 3-4; John K. Smith, “Quantitative Versu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Attempt to Clarify the Issu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12, No.3, 1983, p. 10.

② Chris Brown,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Anti-foundational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23, No.2, 1994, p. 213.

③ 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第143—161页;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7—141页。

④ Phillip Darby and A. J. Paolini, “Brid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stcolonialism,”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19, No.3, 1994, p. 389.

⑤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 7.

接触中演化而来的。^① 后殖民理论认为,现代性看似客观的本体论假定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知识与种族的等级化制度上的历史叙事,在对现代性的追从下,西方国家以自身的发展方式确定了理性与文明的标准,而非西方国家则被塑造造成缺乏人文精神的化外之地。^②

相应地,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提出“殖民性”(coloniality)的概念。他认为,殖民性随现代性而生,是一种融合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认知方式的权力结构。基哈诺深入反思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殖民过程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现代性中蕴含的殖民性催生了西方的殖民活动,使之成为近代欧美国家资本化与全球化的底色。因此,殖民主义不仅是从物理意义上对非西方国家的征服,更是在知识生产的征服。^③ 殖民性根植于西方近现代的权力结构之中,只要殖民主义的认知方式继续存在,学术话语、观念与实践就依旧会对非西方的种族与地域抱有偏见,令非西方国家无法跳出现代性来书写自己的历史。^④

(二) 后殖民理论的认识论

后殖民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也革新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一般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以科学实在论为主导,其特征包括可证伪性、认知中立与普遍主义等。^⑤ 而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反思和解放的理论,则提出不同认识视角和认识路径,与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一致,后殖民理论不是简单地排斥所有的西方知识,而是鼓励国际关系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视角,破除对科学路径与普遍主义的全盘接受,打通跨

① 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p. 2; Mustapha Kamal Pasha, "The 'Bandung Impul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58-159.

②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Cultural Studies*, No. 21, 2007, pp. 168-178; Inayatullah and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③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pp. 168-178;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p. 2-4, 10.

④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pp. 168-178; Walter D. Mignolo, "Delinking: The Rhetoric of Modernity, the Logic of Coloniality and the Grammar of De-coloniality," *Cultural Studies*, Vol. 21, No. 2, 2007, p. 469.

⑤ 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第62—86页;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pp. 168-178.

文化学习与交流的渠道,将自身从“他者”的位置中解放出来。^①

后殖民理论坚信,认知人类社会的方式不可能与认知自然世界的方式完全一致,它借鉴福柯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考察,强调知识是“有情境性的”(situated),知识很难不受权力运作方式的影响。^②更进一步而言,与其他反思主义理论相似,后殖民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生产是“再现”的过程,而再现又是研究者作为人类主体“对自己境遇的参与”,因而,所有的“再现”都内嵌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语言与制度中。^③这意味着后殖民理论彻底打破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中立假定,不承认存在完全客观地认知外部世界的可能,它认为历史演进不是独立于人的思想与观念的,因而批评主流理论(尤其是行为主义理论)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分离的做法。

主体与客体的边界被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不断强化^④,后殖民理论在哲学层面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路径,它指出“叙事”在各种理论描述、分析与解释或阐释世界时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理论不将知识视为不证自明的,而是追问与质疑主流理论的种种假定。^⑤如果仔细思考后殖民理论的这种属性,可以发现,它遵循了平衡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辩性逻辑”,试图在多元、开放的研究与讨论中最大程度地复现真实的历史。^⑥后殖民理论希望打开国际关系研究的认知视角,在国际关系历史与实践中接纳和包容更丰富的声音。

在此基础上,后殖民理论在对待因果机制、理论普适等方面也与主流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明显区别。后殖民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无法排除价

① 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第141—147页;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2003, pp. 162-163;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14, pp. 188-191; L. H. M. Ling and Carolina M. Pinheiro, “South-South Talk,” in Arlene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pp. 333-335.

② John Baylis, et al.,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p. 181; Wisam Kh Abdul-Jabbar, *Negotiating Diasporic Identity in Arab-Canadian Students: Double Consciousness, Belonging, and Radicaliz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62.

③ 卢凌宇:《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欧洲论坛》2022年第2期,第141—142页;Sanjay Seth,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30.

④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实践意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4日。

⑤ Jan Wilkens, “Postcolon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8.

⑥ 更多探讨参见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 1-39.

值观念,因而注重文本的阐释动机和内嵌的研究者偏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体论中的“殖民性”相类似,一部分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理论的认识论包含着权力的“殖民性”,所谓客观理性地建立对世界的认知并发掘其中的因果联系必然是带有偏见的。^①因此,后殖民理论不刻意寻求解释国际现象的因果机制^②,而是更侧重从内部理解国际社会各类现象的发生过程,认为理论的作用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而非必然要解释世界。^③

同时,后殖民理论对待经验的态度更加谨慎,它以互动、主体间性的视角深刻剖析事件在具体历史节点下的意义,强调理论在特定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形成与应用。^④这意味着,后殖民理论不轻信理论的普适性,即不认为只要获得既定条件就可以将理论的推理结果推广至任何情境与场合,从而与西方主流认识论中的普遍主义与科学倾向拉开距离。^⑤

(三) 后殖民理论的方法论

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决定了后殖民理论的方法论与传统理性主义理论大有不同。主流理论把国际关系研究当作理性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和分析,偏爱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客观”分析,主张建立严密科学、简化抽象的模型,研究可被观察与量化的国际现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偏好使用实证主义尤其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把研究置于世界的物质性与客观性基础上。行为主义的方法将研究对象简化为可量化的数字指标,寻求普适化与通则化的因果解释。在国际关系学科第二次大辩论后,行为主义方法在美国盛

① Walter D. Mignolo, “Delinking: The Rhetoric of Modernity, the Logic of Coloniality and the Grammar of De-coloniality,” pp. 303-368; Walter Mignolo,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and the Colonial Difference,” in Mabel Moraña, et al., eds.,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25-258.

②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 69.

③ James N. Rosenau, “Before Cooperation: Hegemons, Regimes, and Habit-Driven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0, No.4, 1986, p. 894.

④ 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第144—145页;Shampa Biswas, “Empire and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s: Reading Edward Said as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 *Millennium*, Vol.36, No.1, 2007, pp. 117-133;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Knopf, 2012.

⑤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305页;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pp. 188-191; L. H. M. Ling and Carolina M. Pinheiro, “South-South Talk,” pp. 331-333.

行并主导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否采用“科学的”、普适抽象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判断一项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①

后殖民理论意识到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弊端,指出主流理论的方法论会忽视国际社会的演化过程与历史特征,更会加深量化模型隐含的立场与权威话语,以至研究走向偏狭。^② 总体而言,后殖民理论主张采取后实证主义的、多元的研究路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文化情境不可分开、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话语和立场秉持谨慎且批判的态度是后殖民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最重要特征。^③

不过,后殖民理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当理论承认世界是主客观交织的、恒久变化的,那该如何才能保证后殖民理论的学术研究是扎实的而非虚浮的,是学术性的而非口号性的呢?后殖民理论尝试从方法论层面对这个挑战予以回应,它希望以一种深入历史的、“深描式”(thick description)的研究方法来确保理论的专业性与生命力。

具体而言,后殖民理论方法论的三大特质保证其学术性。第一,后殖民理论以历史性的路径研究国际问题,重视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和具体情境,重视在历史沿革中的观念与社会记忆发挥的作用。^④ 自20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学科经历“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历史的厚度与深度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褪色。后殖民理论则让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再度重视历史与哲学等人文学科,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由于深受全球殖民过程的影响,历史的深度对国际关系学科尤为重要,它使研究“人”本身和各种独特的经验成为可能。因此,后殖民理论试图重新唤醒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历史意识。

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历史的重视,历史性的研究路径保证了一种包容的、细致的视角。后殖民理论立足于世界历史,将殖民

① Michael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p. 24-26; Thomas Biersteker, "The Parochialism of Hegemony: Challenges for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08-327; Patrick Jackso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188-191.

② 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48—50页;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第117—141页;Michael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p. 3-5.

③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 3.

④ Sanjay Seth,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5-29.

扩张的历史过程纳入国际社会构建之中,并将东西方互构的背景作为重要的研究素材。^① 后殖民理论始终在提醒研究者,不深入研究殖民历史,就无法真正意义上理解西方的近代化过程及此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在针对特定的问题展开案例分析时,后殖民理论考察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研究问题的,并追踪研究对象是如何在殖民历史中不断演变的,运用厚实的档案资料和详细的理论阐释完成研究。^② 这种细致的历史性路径使后殖民理论可以发掘出许多未被主流研究重视的细节,提供对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呈现,为反思主导性元叙事奠定基础。^③

第二,后殖民理论综合运用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等反思性方法作为补充,强调对现有的主流叙事方式进行突破。主流理论构建出一种普适的元叙事,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多样内涵,造成了这些国家“叙事的断裂”(narrative break)。^④ 后殖民理论强调,研究国际互动需要考虑到书写殖民历史的主体的复杂性,关注未成为主流叙事的其他多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后殖民理论的方法论是与超越元叙事紧密联系的,它批判将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截然两分的线性史观,批判主流理论忽视了非西方的历史。^⑤ 为还原一个复杂多元的历史进程,后殖民理论要求国际关系研究以历史文本与个体经验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从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角度出发,探究被主流理论无视的那部分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完整经历。^⑥ 例如,萨义德引入的“对位

① Branwen Gruffydd Jones, "Slavery,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ostcolonial Reflections,"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9-69.

② Wisam Kh Abdul-Jabbar, *Negotiating Diasporic Identity in Arab-Canadian Students: Double Consciousness, Belonging, and Radicalization*, p. 63;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7, No.3, 2012, pp. 772-793.

③ Sankaran Krishna, "Race, Amnesia, and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26, No.4, 2001, pp. 401-424; John M. 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p. 46-69.

④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5-115.

⑤ Jan Wilkens, "Postcolon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3; Columba People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80-95.

⑥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p. 4; Siba N. Grovogui, "Defering Difference: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Race Problem' in Moral Thought,"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6-121.

法”(contrapuntal reading)是超越主流叙事的一种有效研究路径。“对位法”源自音乐理论,本义指在音乐中有多条同时演奏的、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的旋律线条,遵循“对位法”的音乐没有一支旋律完全居于主导地位,而是由各个旋律共同构成乐曲整体,呈现出复调式的音乐特征。在后殖民理论的框架下,“对位法”研究方法指重视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的共时性与互建性,承认前殖民地与殖民过程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元素。^① 用“对位法”研究国际关系意味着不仅关注宗主国的历史,更关注由殖民地组成的“复调旋律”,使被边缘化的群体记忆回到国际社会中来。^② 与单纯地纳入多元声音的研究方法不同,后殖民理论多使用动态过程追踪法,以互动的、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思考各个主体在历史演化中的互动与变化,从而避免国际关系研究走向简单化和片面化方向。^③

第三,后殖民理论主张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主动与其他前沿理论融合。^④ 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缺乏全球关照,非西方国家多处在被忽略的境地,即使偶被提起,也仅充当主流理论的历史“原料”和“实验室”。^⑤ 为了超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发挥出不同技术手段与思维方式的优势,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史的“融通与互鉴”显得分外重要。^⑥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几大特色,一是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把行为体置于全球政治经济图谱中,以包容开阔的视角对待多重声音;二是以具体的、深入情境的方式展开研究,在构建宏大叙事的同时重视原始资料,展现历

① Geeta Chowdhry, “Edward Said and Contrapuntal Reading: Implications for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36, No.1, 2007, pp. 101-116;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pp. 66-67.

②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51.

③ 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pp. 7-8.

④ Kalypso Nicolaidis, et al., “Echoes of Empire: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aisal,” in Kalypso Nicolaidis, et al., eds., *Echoes of Empire: Identity, Memory and Colonial Legacie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pp. 1-3.

⑤ 崔蕊满:《融合发展:跨学科史学研究的创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1日;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进》,第143页。

⑥ 对全球史的重视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突破“西方的傲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参见刘德斌、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第141—143页;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第61—62页;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p. 647-659.

史事实的个体形态。^①正是由于借鉴这样的历史学路径,后殖民理论得以恰当地介入研究对象,破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封闭性,使学科研究议程更具全球视野。^②

除了与历史学的对话外,后殖民理论还大量采用源自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路径,目前常使用的话语分析、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就源自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③由于博采多门学科之长,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切入点可大可小,既可以从国家层面分析各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整体特色,也可以从个体层面分析个人的身体经验对国际社会的形塑作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其得以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选取不同的研究工具。例如,在涉及宏观层次时采用整体民族志等方法,在涉及个体层次时采用焦点小组(focus group)等方法。^④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后殖民理论希望真正意义上唤起非西方国家的理论自觉,构建基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历史和实践的理论框架。

此外,后殖民理论可以很好地和其他前沿理论充分结合,丰富国际关系学科认知世界的视角和工具。^⑤后殖民理论经常融合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等反思主义理论,分析处在多重劣势社会身份中的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⑥比如,当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时,它指出殖民霸权与父权是一体两面的,欧洲的“自我”意识通过以征服为代表的父权特征而构建,而殖民地的“他者”身份则由无力发声、被动接受等传统上被认为偏女性化的气质构成,用

① 张小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通与互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0日;王立新:《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0日;卢凌宇、沙子舒:《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研究的借鉴与融合:从约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谈起》,《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5期,第36—53页;John Lewi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 75-85.

② 这种路径的代表性作品可参见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Kalypso Nicolaidis, et al., eds., *Echoes of Empire: Identity, Memory and Colonial Legacies*; John M. 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③ John M. MacKenzie, “Analysing ‘Echoes of Empire’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Personal Odyssey of an Imperial Historian (1970s-Present),” in Kalypso Nicolaidis, et al., eds., *Echoes of Empire: Identity, Memory and Colonial Legacies*, pp. 187-204.

④ 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pp. 9-10; Siba N. Grovogui, “Deferring Difference: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Race Problem’ in Moral Thought,” pp. 106-121.

⑤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p. 46-69.

⑥ 即关注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247—251页。

这种方式理解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互动可以发现原有研究中未曾被重视的角度。

三、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研究议题与发展前景

后殖民理论希望通过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议题来重新审视国际互动,实现对既有学术范式的超越。^① 后殖民理论肯定第三世界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与知识的价值,希望基于此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历史叙事方式。^② 需要指出的是,后殖民理论提供的“替代性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再读”“重读”历史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后殖民理论与传统理论处于不可兼容的关系中,后殖民理论并不寻求对主流理论的排斥与压制,而是希望从规范性的和反思性的角度予以调整和补充,在与主流理论的论辩中达成对彼此的认知,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国际关系实践。

(一) 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后殖民理论通过反思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突出了理论的思辨性。西方主流理论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往往以既定的概念展开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将“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权”(sovereignty)等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概念视为天然存在之物。然而,事实上,这些由西方政治经验塑造的概念蕴含着话语偏见,不加思考地接受无益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后殖民理论对此进行概念反思。

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反思体现了后殖民理论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后殖民理论质疑以民族国家作为描绘当今世界政治形式的唯一方式的适当性,认为现有民族国家形式的正当性先天不足,欧美殖民者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掩饰下攫取了大量资源,获取了自近代以来的优势地位。殖民地民众对民族国家等现代概念有着完全不同于欧洲宗主国的理解,但殖民者却强行

① Phillip Darby and A. J. Paolini, “Brid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stcolonialism,” pp. 371-397;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p. 2; Sankaran Krishna, “Race, Amnesia, and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01-424.

② J. Marshall Beier, “Beyond Hegemonic State(ments) of Natur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Non-state Possi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2-114.

在殖民地复刻了母国的政治结构。^① 后殖民理论指出,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不仅容易在前殖民地国家引发因生硬套用而造成的族群矛盾,还会致使第三世界国家丧失在经历殖民之前固有的身份属性,产生强烈的割裂感与流散感。^② 不仅如此,主流理论对民族国家的定义缺乏对各具特色的文化、语言与历史语境的考察,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在独特的背景与殖民互动中发展而来的。^③ 因此,后殖民理论不认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轻率地将民族国家视作普适的与天然的,强调这种研究模式无法适用于分析文化差异与非西方经验。

对“民族国家”的深入反思必然影响到对“主权”的理解,后殖民理论亦对“主权”概念进行重构。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类似,主权被描述为一种单一的、不变的威斯特伐利亚形态,而忽视了其在不同地域的不同表现。后殖民理论主张在审视主权时必须从具体的时空中出发,考虑其外部结构、社会力量和文化背景,也即主权的表现形式是随着社会历史而演化的。^④ 从时间上看,西欧民族国家确定其主权的过程耗时几个世纪,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至今仍不足百年,其国家建设尚在初级阶段。^⑤ 从空间上看,主流的主权概念仅建立在西欧近代以来的本土经验上,不仅忽略了主权的早期形态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的联系,还忽略了殖民过程中对主权的多种解读。^⑥ 更进一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的话语常将不满足其定义的主权要求的国家定义为“失败国家”,为干涉这些地区提供了理论依

① Sudipta Sen, “Uncertain Dominance: The Colonial State and Its Contradictions,” *Nepantla: Views from the South*, Vol.3, No.2, 2002, pp. 391-406.

② Erik Larson and Ron Aminzade,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s: the Cases of Tanzania and Fiji,”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59, No.192, 2008, pp. 169-182; Wisam Kh Abdul-Jabbar, *Negotiating Diasporic Identity in Arab-Canadian Students: Double Consciousness, Belonging, and Radicalization*, pp. 47-51.

③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 Sankaran Krishna, “IR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 N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India,”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4-143.

④ Navnita Chadha Behera, “State and Sovereignty,” in Arlene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pp. 139-141.

⑤ Ibid., p. 147.

⑥ John M. Hobs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estphalian Frontier,”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48; Robert H. Jackson,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0-55.

据。^① 鉴于此,后殖民理论反对用单一僵化的概念要求与评判新兴国家的主权样态,而主张从多样、可变的视角考察主权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表现形式。

除了反思国际关系基本概念中的话语偏见,后殖民理论还扩充了部分核心概念的意涵,如“不平等”这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指出,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平等”被视作国际体系的一个特质,甚至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个必要元素,而后殖民理论则认为主流理论对不平等的理解是狭义的,不平等并非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是与殖民性有多层次联系的关键概念。^② 后殖民理论对不平等的探析的初期形式承袭20世纪70年代依附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权力和财富领域的不平等。在后殖民理论发展的最新阶段,对不平等的理解愈加深入,不仅考察政治、经济层面的不平等,还指出认知领域的霸权状态,非西方的知识被以“非科学的”名义排除在外。在后殖民理论视角的经典论述中,主流理论强调的“文明差异”是确立不平等的方式,西方通过塑造“差异”来定义自身和加强统治。因此,东西方差异是在殖民相遇之时就被西方主动塑造的,并在漫长的殖民与去殖民过程中不断被再生产,为维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提供理由。^③

此外,后殖民理论还为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了极富非西方特色的概念,以此补充主流理论对特定国际问题的理解,实现国际关系学科核心概念的革新。例如,后殖民理论引入“乌班图”(ubuntu)这一西方话语中本没有的概念,乌班图是一种在非洲南部广泛分布的政治哲学理念,其基本含义是个体是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社会秩序在相互尊敬、彼此联系的行为体中构成。^④ 乌班图的理念在非洲哲学和社会学中已被多次讨论,当后殖民理论将它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后,这个概念可以弥补主流理性主义理论在认识非洲南部国家

① Siba Grovogui, "The State of the African State," in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pp. 117-138; Mahmood Mamdani,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r Right to Punish?"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4, No.1, 2010, pp. 53-67.

② Joao Pontes Nogueira, "Inequality," in Arlene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pp. 241-245.

③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④ Nomonde Masina, "Xhosa Practices of Ubuntu for South Africa" in I. William Zartman, ed., *Traditional Cures for Modern Conflicts: African Conflict Medicin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0, pp. 169-182; Richard H. Bell, *Understanding African Philosophy: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89-90.

特定行为时候的不足。比如,这些国家对伦理的重视和在特定问题上“坚定地站在一起”(stick together)等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背后反映的是乌班图式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理念。^①同时,乌班图还为良好的国际关系实践提供了一种路径可能,即通过强调个体间的协作与依赖来构建以人为出发点的国际共同体,在此意义上,这一概念不仅是解释性的,亦是规范性的。^②

(二) 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题

后殖民理论还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方面做出贡献。事实上,对研究议题的补充恰能展现出后殖民理论的包容性,意欲改善理性主义理论预设的偏好与假定在特定国际关系议题上的局限,抑或是发现缓解主流理论知识偏见,与之进行理论对话的新研究空间。后殖民理论能够运用自身博采众长的特色补充主流研究中力所不逮的议题,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视角新颖的案例研究。^③

以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和全球化理论为例,可以看出后殖民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革新。由于国际关系学科中主流的安全研究是以西方国家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实践为基础的,其核心议题一般集中在大国关系、大国间的权力竞争等相关话题上,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问题(如小国战争、国内族群冲突等)被放置在次要位置上,只有当其影响到大国关系之时才会得到主流安全研究的关注。^④需要承认的是,在当今波谲云诡的时代背景下,对高政治议题、大国关系议题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正如《后殖民理论与国际关系:批判性导读》一书中所指出的,在高度全球化的年代里,不充分了解小国的

① Karen Smith, "Contrived Boundaries, Kinship and Ubuntu: a (South) African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eds., *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 pp. 312-313.

② 事实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规范性议题上的欠缺恰恰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对“应然”的关注可以彰显国际关系的人文关怀,参见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7页。

③ 陈晓晨:《“人的安全”与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第78-79页。

④ Tarak Barkawi, "Empire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ies," pp. 1360-1379; Columba People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p. 80-95; Tarak Barkawi,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in Sanjay Seth, ed.,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8-93.

行事逻辑与决策模式就无法真正维护大国的安全。^①

后殖民理论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科中安全研究的范畴,它不以是否有大国的正式参与为限,充分关注个人、族群、女性、文化与环境的安全等议题。^② 在国际关系学界,除后殖民理论外,还有其他具有反思性的理论拓展着安全研究议题^③,如果仅仅从扩展研究议题的角度而言,后殖民理论和其他具有反思性的理论有诸多共通之处,但是,后殖民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对研究议题方面的贡献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殖民理论深化且重新界定了安全的主观与客观的交织性和互动情况,尤其关注以人为核心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议题,这与后殖民理论对“人”的重视相呼应。^④ 后殖民理论指出,“本体安全决定着个体究竟如何定义自身,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与选择”,第三世界国家时常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场域,前殖民地的民众曾经或正在遭遇对身体与心理的有形和无形的控制,民众被迫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自身的生活方式。^⑤ “生命政治”为安全研究开辟了新地带,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深入了私人领域,致使前殖民地民众甚至无法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身体(如帝国与现代医学的关系)。^⑥ 此外,后殖民理论指,来自西方的“视听文化”(audiovisual culture)、艺术与教育等多种形式强行打破了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在给前殖民地国家带去西方定义的科学和文明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的

① Sanjay Seth, “Introduction,” p. 7.

② Tarak Barkawi, “Empire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ies,” pp. 1360-1379.

③ 比如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理论等,参见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21-49.

④ 后殖民理论的安全研究融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此处的“主观”意味着安全问题是无法从主观的观念世界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的,参见 Ali Bilgic and Jordan Pilcher, “Desires, Fantasies and Hierarchies: Postcolonial Status Anxiety through Ontological Security,”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48, No.1, 2023, pp. 3-19.

⑤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 344; Columba People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p. 80-95;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7.

⑥ See David Arnold, *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7, 163, 187-192.

民众造成了质疑自身文化的巨大缺失感。^① 有学者指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以现代性为外壳的文化强制,它的波及范围很大,不仅影响着前殖民地国家,甚至在许多未曾有过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亦普遍存在。^② 后殖民理论通过回溯历史、回归个体的方式找寻第三世界国家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注重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识别与改善殖民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强制,在理论建构中重塑第三世界的安全观,以此缓解第三世界国家个体和群体身份属性缺失导致的不安全感。^③

全球化是后殖民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广义的全球化指的是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即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活动在全世界传播与互联。^④ 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全球化理论一般集中在两个核心主题:一是强调全球化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自发行为,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有助于所有的文明向西方文明“进化”;^⑤二是全球化弊端可能会威胁西方文明和国际秩序,并逐渐演化为“文明冲突论”的论点,成为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曲折波动的一个原因。^⑥ 后殖民理论指出,主流全球化理论的这两大主题均带有强烈偏见。第一种论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能动性,也忽视了殖民主义和非正式帝国在全球财富分配、政治权力与军事实力领域造成的巨大不平等,没有反映出复杂历史中西方与非西方的交汇与联系。^⑦ 第二种论述虽然承认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互动与互构,但实质上是将西方的特权与优越自然化了,剥夺了非西方

① Giorgio Shani, *Religion, Identity and Human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4; Ali Bilgic and Jordan Pilcher, “Desires, Fantasies and Hierarchies: Postcolonial Status Anxiety through Ontological Security,” pp. 3-19.

②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15; 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第 107—116 页。

③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33-142.

④ 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60 页;Matthew Louis Bishop and Anthony Payne,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fferent Globalizations: Theorizing Re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Vol.18, No.1, 2021, pp. 1-21.

⑤ John M. Hobson, “Globalization,” in Arlene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pp. 232-233;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⑥ John M. Hobson, “Globalization,” pp. 222-22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Touchstone, 1996.

⑦ John M. Hobson, *Multicultural Origins of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Alina Sajed and Naeem Inayatullah, “On the Perils of Lifting the Weight of Structures: An Engagement of Hobson’s Critique of the Discipline of IR,”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19, No.2, pp. 201-209.

国家形成自主的历史叙事的权利,进一步加剧了认知领域的暴力。^①

基于此,后殖民理论提出了“辩证的”全球化思路,它颇具洞见地指出,反对全球化的人并不是在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反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与霸权主义形式。^②“辩证的”全球化思路路径指出,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会逆转,但需要突破主流理性主义内含的对立思维,将非西方国家作为具备能动性的施动者纳入理论构建中,重视其所能发挥的生成性力量。后殖民理论希望创立基于平等和全面视角下的全球化理论,这意味着不仅要對主流的全球化理论中的殖民主义属性予以识别,还需在不同领域缓解不平等状况、创造更公平的国际秩序:在经济层面上,后殖民理论视角的全球化要求非西方国家打破经济依附的联结,探索建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文化层面上,承认西方近代的全球化进程有其东方贡献,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在社会关系层面上,重视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互联,在增加个体与国家自主性的同时改善国际体系的结构。^③

(三) 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前景

后殖民理论在研究数量、理论建构与全球影响力方面均取得很大进展,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独特且新颖的视角。不过,目前的后殖民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自觉意识欠缺、对话交流不足等弊端。因此,为了促进后殖民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与革新,真正意义上将“后殖民”的思路可操作化地融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就需要寻找理论的转向与突破。具体而言,可以将以下三个方向作为理论未来的着力点。

第一,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需要培育更清晰的理论自觉意识。后殖民理论从曲折的历史实践与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中萌芽与发展,其理论的内涵、应用范围与研究方法都非常多元繁复,因而势必存在理论内部的分歧。内部

① John M. Hobson, *Multicultural Origins of the Global Economy*; L. H. M. Ling, *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quest and Desir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 8;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John M. Hobson, “Globalization,” pp. 234-235.

③ Pinar Bilgin, “Thinking Past ‘Western’ I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1, 2008, pp. 5-23; John M. 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John M. Hobson, “Globalization,” pp. 246-247; L. H. M. Ling and Carolina M. Pinheiro, “South-South Talk,” pp. 331-333.

的争鸣在理论发展早期有助于充实理论内容,但是,在后殖民理论已经逐渐形成稳定的内涵的时候,培育理论的自觉意识与自主心态就显得至关重要。后殖民理论可以作为独立的学术视角,以此指导研究者在未来展开基于理论的案例研究。因此,现阶段后殖民理论的任务不单单是唤醒国际关系学科对殖民历史的承认与重视,更应是从已有的观点中抽象出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思路,寻找理论内部流派中具有本质性、同一性的特征,弥合彼此之间可以调和的分歧,避免后殖民理论陷入庞杂模糊的境况。后殖民理论尊重内部流派在具体研究路径上的差异,但也需要更清晰稳定的研究棱镜,主要囊括以下组成部分:后殖民理论的核心假设(殖民主义在世界历史与当下的普遍性)、理论的基本内容(殖民经历对个体经历、民族意识与世界结构的具体影响方式),以及理论的研究路径(以“对位法”、文本分析等方法为代表的历史性的、反思性的研究路径)等要素。

第二,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需要积极介入学科讨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浓缩为一部观点交锋的大辩论史,说明理论间取长补短是推动学科进步的必要条件。^①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近年来成为广受讨论的主题,为理论交流打开了良好的窗口,后殖民理论应与之一道主动寻求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机会,用问题导向的研究打通平台,突出自身为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不一样的解决思路的特色。^② 后殖民理论研究者不能因为批判主流理论中的霸权思维而排斥与主流理论交流,相反,应以辩证的和互补的视角审视后殖民理论自身与主流理论的关系,如此才能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在范式层面的革新。^③ 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还应开展和其他具有反思性与解放性的学术理论的对话。在跨学科的理论探讨中明确自身的主张并非易事,但后殖民理论与各种理论的交流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包括后殖民理论在内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任务正是共同打破西方主流理论的智识垄断地位,突出多重叙事的理论贡献,提高国际关系学科整体的思辨性。^④

①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1-39.

② Eun Yong-Soo, “Global IR through Dialogue,”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9, p. 139.

③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1-39.

④ Arlene Tickner and David Blaney, “Introduction: Thinking Difference,” pp. 2-4; 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第143—145页。

第三,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尽管批判西方主流研究的反思主义思潮早已出现,全球国际关系学也日益得到重视,但是,现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路径、研究工具和研究话语仍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学界主导。^①后殖民理论等前沿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对话交流尚不够充足,还是一种地方性、边缘化的理论。为了在百家争鸣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确立理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后殖民理论需要与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与实践相结合。后殖民理论助力“中国学派”的发展并不是创制“中国例外论”或“中国中心论”,而是在积极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互学互鉴的同时,坚定自身在本源上对西方理论的挑战,明确自身作为一种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②从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出发将为理解乃至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分析思路,展现出后殖民理论的反思特质,从而形成更具延展性与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结 语

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言:“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性,还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对待西方的态度上的困惑。”^③这说明国际关系不仅是物质实力上的互动,更是话语与叙事上的互动,虽然殖民主义的形式已经消亡,但是,如果不加审视就依照主流理论的模式开展国际关系研究,将会丧失跳出西方主流叙事的可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通过批判的、解放的全球路径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理论,为更充分地认知全球国际关系实践带来启发。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梳理了后殖民理论的学术历程与基本内涵,探讨了后殖民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相融合的可能

① 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第83—84页;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1, pp. 22-38; Geeta Chowdhry and Sheila Nair, “Introduction: Power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Race, Gender, and Cla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9.

②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40—42页;任晓:《国际关系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46—48页;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第86页。

③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 85.

性、独特性和适用价值。

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的使命是从本源上识别西方主流理论的偏狭,以包容与多元的视角扩展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思路,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后殖民理论期望打破国际关系学科“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模式,激发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潜力,打破以理性主义为首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霸权。^① 国际关系的后殖民理论将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一起,把厚重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经验与知识之上,使这门学科不再一味延续西方主流理论的研究模式,从而实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创新、方法拓展和范式超越,真正意义上展现国际关系学术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在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后殖民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突破的关键。后殖民理论以其深入历史的、情境式的研究视角为沟通本土与全球的创新性理论开辟了路径,这启发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保持中国特色,同时兼具全球关怀。^②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冲破现存的西方主流理论框架的限制,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提供智识资源。后殖民理论的终极目的是打破西方与非西方二元思维的藩篱,构筑真正具有全球色彩的国际关系学,创造属于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融合了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以更充分地将中国特色的本土经验和感受注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提高理论自觉意识与自主心态,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者,为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中国经验、中国观点和中国智慧。

^①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p. 2.

^② 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第146—147页;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第86页。